

乐 亭 大 鼓

王 树 彬
陈 立 颖

政协乐亭县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研究乐亭大鼓 发展乐亭大鼓

徐兴信

在一个县产生两种戏曲，全国绝无仅有。乐亭大鼓和乐亭皮影都因为诞生在乐亭县而得名。为了研究、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乐亭县政协在编辑出版《乐亭皮影》之后，又编印《乐亭大鼓》。《乐亭大鼓》书稿的作者王树彬和陈立颖，土生土长乐亭人，精通曲艺，钟情大鼓，长期从事乐亭大鼓的研究和创作。他们历经多年，广泛收集乐亭大鼓资料，潜心整理成卷，这是第一部系统总结介绍乐亭大鼓的著作。这部书稿的出版，对于推动研究和发展乐亭大鼓有积极意义。

民族文化的积淀诞生了乐亭大鼓，提倡研究乐亭大鼓，就是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注意提高和发展乐亭大鼓，就是弘扬民族艺术。祖国丰富文化孕育的乐亭大鼓，于清代中叶诞生在乐亭县，不是偶然的。乐亭是金·大定末年由马城县析出建置的偏隅海边小县，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明朝和清朝强盛时期，分别从山西、内蒙和江南大批移民到乐亭，满清皇族还分封到这里圈地开垦、建皇庄。移民们带来了黄河流域、江南和东北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乐亭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文化，与当地的地域文化融汇厚积在一起。到了清代中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间文娱活跃，乐亭乡间流行的“清平歌”等得到集中发展，才萌生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北方主要曲种之一——乐亭大

鼓。乐亭大鼓是祖国民族艺术的奇葩，我们要从继承和发展民族艺术的高度，研究乐亭大鼓，提高发展乐亭大鼓的自觉性。

乐亭大鼓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发展乐亭大鼓，归根到底，是要抓住为谁所需要，为谁服务的问题。乐亭人传说能歌善舞，喜娱乐。乐亭方言有强烈的旋律性，说话如“唱话”，连卖泥人的、卖药的、卖香面的等，都是唱着做买卖。当地人劳动之余常唱的民歌，更是悦耳动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乐亭大鼓，来自人民群众，格外受到他们的欢迎。艺人说唱，民间自娱自乐的人爱唱，人们在农闲或劳动间歇常唱。乐亭大鼓受到广泛欢迎，还因为大鼓的表演形式非常适宜人民群众随时随地欣赏。在实践中改进和完善的乐亭大鼓，表演者一般二至三人，道具也简便，表演者一边击鼓一边说唱，伴奏者只用三弦。今天，时代新了，经济和文化科学技术在发展，人们的活动方式和观念在变化，乐亭大鼓也要随着改革提高，记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一根本，很好研究新情况下人们对曲艺的新需求，对发展乐亭大鼓是有益的。

乐亭大鼓的发展、提高，与经济的发展、支持分不开，过去如此，今后仍然如此。剥削制度下的旧社会，贫富悬殊，但号称“京东第一皇庄”——庙上崔家、“京东第一家”——汀流河刘家和小黑坨张家、大港史家等豪族巨富的出现，毕竟说明乐县这方水土的经济实力，这客观上为乐亭大鼓、乐亭皮影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了物质条件。富人思乐，寻求高水平的艺术享受，于是不惜耗资，网罗艺人，“养”大鼓、皮影戏班。崔家办戏班最早，满足自己欣赏外，还带艺人进京

给王爷献艺，才得名“乐亭大鼓”。以乐亭县崔、刘、张、史四大家为代表的富人家长期办戏班，重视人才培养，词曲创作，表演艺术精益求精，同时带动了民间艺人，乐亭大鼓水平空前提高。物质是发展文化艺术的基础。今天，如何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针对乐亭大鼓的不景气，进行有的放矢、切实有效的扶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为乐亭大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后乐亭大鼓的繁荣，希望在人才。乐亭大鼓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艺术家们的心血和才华，无论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乐亭大鼓艺术家，凡是为乐亭大鼓的发展和提高做出贡献的，他们的业绩永留丰碑。目前，乐亭大鼓和许多民族传统曲艺一样，正面临通过改革求发展，这里关键是要有胜任的艺术人才，一批继承和发扬乐亭大鼓艺术家们敬业精神的优秀人才。他们应该是忠诚于乐亭大鼓艺术事业，淡泊名利，不畏艰难，刻苦从艺；业专艺精，不墨守成规，博采广纳，进取不止。社会呼吁这样的人才，我们要切实抓出一批来。这样，乐亭大鼓的振兴和发展就充满希望。

1997年12月29日

目 录

研究乐亭大鼓，发展乐亭大鼓 徐兴信

第一章	乐亭大鼓的渊源与发展·····	(1)
第二章	乐亭大鼓的文学结构·····	(27)
第三章	乐亭大鼓行规行俗·····	(49)
第四章	书词创作和书目·····	(57)
第五章	艺人传·····	(84)
	清门主要艺人宗谱表·····	(84)
第六章	轶文传说·····	(131)
第七章	乐亭县曲艺活动年考·····	(163)
后记	·····	(187)

第一章 乐亭大鼓的渊源与发展

乐亭大鼓为我国北方的主要曲种之一，发源于河北省乐亭县，盛行于冀东广大地区，但在北京、天津、承德及东北三省亦有相当的影响。唱词韵、散相间，说唱并重，具有浅显易懂、雅俗共赏等多种特点。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分“上”、“凡”两个腔系。它庄严里兼有优美，委婉中包含古朴。板式完备，句式简练，调式、调性转换巧妙灵活，刚柔相济，褒贬兼宜，抑扬惬意，风趣得体，是鼓曲类中发展得相当成熟的一种说唱音乐。它浓重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受到群众的深深喜爱。

一、乐亭大鼓的渊源衍流

乐亭大鼓是我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产物，是说唱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根深土沃源远流长。其源可追溯到唐代变文，其流历经宋、元、明、清诸代的多种说唱形式。自唐代产生变文以后，我国的说唱艺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代相继产生了多种艺术形式，它们互生互叶，代代相因，形成了一条自然连锁繁衍线。所以，各种艺术形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互相独立的，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从变文的诞生到乐亭大鼓的问世，其间经过了鼓子词、唱

赚、诸宫调、杂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影响、蜕化，有些是嫡生物，有些属衍生物。但它们的联系却是极其密切的。首先由变文脱颖而出的是鼓子词。它较变文短小而灵活，是后来某些艺术形式不可逾越的一个过渡阶段。而稍后的唱赚则又进了一步。它不仅篇幅短小，而且已完全抛弃了变文的梵呗之音，来采用民歌做為自己的曲调。当时在诸如唱功、唱法及演出程式上都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发展。对于宋代后期新的艺术形式的形成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宋代的诸宫调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新的艺术形式。它不仅继变文、鼓子词、唱赚等艺术形式之大成，而且为以后的诸多艺术形式树立了楷模。由于它承前启后地首先运用了两个以上的宫调并组织了套数，因而它开创了说唱艺术的新纪元。甚至对元杂剧来看，也存在着因果关系。从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诸宫调的影响是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如果说没有变文就不会有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艺术形式，那么，没有诸宫调就不会有元杂剧，也不会形成南戏、北曲的南北合套，更不会有乐亭大鼓等姊妹艺术的形成。对于它们的由来、演化、联系及历史作用，著名文史学家郑振铎的精辟论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今日所知的最早受到变文影响的，除说话人的讲史、小说以外，要算是流行于宋、金、元三代的鼓子词与诸宫调了。鼓子词仅见于宋，是小型的变文，是用流行于宋代的词调来歌唱的，当为士大夫受到变文影响之后的一种典雅的作品。但变文在民间却流行而成为重要的一种新文体，即诸宫调者是。”他在论及诸宫调时认为：“诸宫调为比较的后起之秀，其歌唱部分的组织，显然受有鼓子词、唱赚、大曲以至转踏等等的影响。”

它们的文学结构是大同小异的,都以七字句为主。故此看来,历代各种说唱形式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唱赚、诸宫调等发展了唱腔音乐;元曲、明词话等则发展了韵文的句式结构等。关汉卿继承并发展了变文的三言结构而为垛字句。元、明间的这一发展对明、清际的丰富多彩的鼓词句式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从鼓词的基本句式或大大发展了的各种变格句式结构看,与历代多种艺术形式皆为互生互叶、连锁繁衍的因果关系。

变文经过唐、宋、元、明各代的不断繁衍发展,在明末清初换身为鼓词。而乐亭大鼓又极好地继承并发展了鼓词,它不仅有七、十字句,而且还有五、八、九、十直至十字以上的连环垛字句,使得乐亭大鼓的唱腔、情趣更加丰富多彩。由于当时作词、作曲和演唱技巧的空前提高,在清代产生多种带有地方韵味的新的说唱形式、板腔已完全具备了条件,再只用民歌做为其唱调,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各地艺人广泛继承和运用了各种文化成就与艺术手法,在各地民歌、民间音乐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方言韵调,先后创作出了多种说唱形式。乐亭大鼓就是其中的一种。

乐亭大鼓的发声、吐字、演唱等法规,显然是从宋、元、明诸代的有关成就继承发展而来的。如明王骥德在《论腔调》中说:“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乐府新声》中又载:“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宜调,而得曲之情尤重。”这是关于设腔施调、表现剧情、刻化人物等方面的法规。这与乐亭大鼓的因情施腔、因情转调、阴阳对比、一声分二色、深入剧情、深入角色等行腔、演唱原则是基本一致

的。

又如《事林广记》中关于唱赚的演唱规则：《遏云要诀》“夫唱赚一家，古谓之道赚。腔必真，字必正，欲有墩亢掣拽之殊，字有唇喉齿舌之异，抑分轻清重浊之声，必别合口半合口之字。”这是关于发声吐字、强弱对比、色彩变化等方面的论述。

在论及演唱的内容、情调等方面，文中又载：“更忌马厮鞦子、俗语乡谈。如对圣案，但唱乐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词，切不可风花柳艳冶之曲；如此则为亵圣。社条不赛，筵会吉席，上寿庆贺，不在此限。”

在关于起调毕曲及演唱时的规范动作的论述中载道：“假如末唱之初执拍当胸，不可高过鼻，须假鼓板衬掇。三拍起因子，唱头一句。又三拍至两片结尾，三拍煞……。”

这些法规在乐亭大鼓中基本在遵循延续着。乐亭大鼓关于发声、吐字、行腔、润色等要求是：字正、腔圆、韵足、味浓；气氛真实，色彩鲜明，气口恰当，鼓板合宜。功夫上要达到巧、俏、蹦、跳、喷、吐、撒、放；效果上要达到有声似无声，无声胜有声，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等。

关于起调毕曲、赶板措字等技巧，乐亭大鼓讲究黑、红、闪、碰、撇、抡、堆、垛等法则。各种板式唱腔有种种鼓头鼓尾。除正常情况外，还可口语起调、口语毕曲。

郑振铎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在论及变文、诸宫调等多种文艺形式的由来及相互关系时认为：“在敦煌所发现的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在宋代突然

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地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琐。……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

总之，变文经过多种形式的演化，在明末产生鼓词是符合时宜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骨架矫健的鼓词经几百年的发展又赋予艳丽的“血肉之肌”乃为自然的艺术产物。乐亭大鼓就是其中之一。

二、乐亭大鼓的形成和命名

乐亭大鼓是在明末产生鼓词以后，在继承历代文化成就的基础上，由当地民歌发展而虚。相传乐亭一带，人民多有能歌善舞的习俗，逢年过节，常常举办群众性的歌舞活动。加之乐亭方言本身就有着自然的旋律性，字声都带滑音，语尾长而回旋，因此，外地人听了乐亭口音都觉得是“唱话”，故稍微上韵上板即成曲调。在乐亭，卖香面的、卖泥人的、买破烂的、卖药的等等都是唱着做买卖，这种地方特点对于说唱伶人构成新腔异调是一种极佳条件。在明、清之际的文艺界中，作曲技巧已空前提高。进入稳定时期的清代阶级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已不满足盛行于明、延续到清的以民歌为主的文艺生活。统治阶级要求有新的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来供他们娱乐；劳动人民则需要既能申

张正义，又能抨击邪恶的褒、贬兼宜的多能性文艺形式来丰富他们劳动之余的精神生活。这种超前性的文化需求趋势，促使当时原有的多种说唱形式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流行于北方的大鼓，形式多种多样，比某些姊妹艺术形式发展得更好。

大鼓又叫民间说书。当时，在乐亭县先后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民间说书。为了标新立异，艺人们争相创立自己的腔调，竞艺之下形成了百花吐艳、百家争新的活跃局面。艺人们在创新腔的同时，对伴奏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尝试。他们发现三弦不仅音色音量极富变化，表现性能强，而且伴奏说唱音乐特别贴切谐和。其中以《清平歌》为基本板腔的一支，首先配用了三弦。这一改革实验获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又经过进一步改革，发展得逐步完善，于是人们都趋而效仿。后来乐亭大鼓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成。为此，马立元的《中国书词概论》中载道：“清初年，乐亭城内凡自娱好乐之人，最爱唱‘清平歌’，同时，乡村中也流行着散曲之类的小调。后来有位弦子李，先以三弦配奏了‘清平歌’，遂而加以改正，使其韵调悦耳动听，较之旧曲大有不同，于是齐呼之为‘乐亭腔’。”以后在演唱实践中，又经过进一步改革提高，约在乾嘉年间，初步形成了乐亭大鼓的板腔雏形。道光三十年（1850年），乐亭著名说书艺人温荣发现了铍翅的清脆音响，并磨制成了第一付铁板。经过一番摸索苦练，又制定了持板、击板的方式方法。次年，他以铁板取代了木板，于是演出场面为之一新，震惊行内外。因用铁板大大优于竹、木板的功能，颇有欣耳悦目之感，故人送温荣外号“温铁板”。

一次，乐亭城南大皇粮庄头崔佑文(崔八厮)进京贡奉时，带温荣恭亲王室献了艺，温铁板的技艺深得王爷的欢欣。当即封了顶子赐了座，并亲定了“乐亭大鼓”之名。消息传出，誉满京畿。在京期间，温荣广泛与鼓曲界交流技艺，更使他获益匪浅。回乡，温铁板又将鼓、板、演唱、伴奏、道具等做了系统、规范的定型。由是，温的影响日显，名声大噪，后学子弟辈纷纷拜门从师，平辈业者亦渐渐归顺，不几年，温铁板就将流派繁多，组织素杂的众多艺人一统门下，门户“清门”，门徒号称“清音子弟”。宗谱分十代，即玉、月、和、德、来、学、文、智、华、开。温属第三代，艺名和卿。

为此，傅惜华的《曲艺论丛》中清楚地载记着：“乐亭大鼓，简称乐亭调，为北方俗曲鼓词之一种，产生于乐亭县，故名。”

三、乐亭大鼓的发展及九腔十八调的形成

乐亭县有着发展文艺事业的良好条件。如果说乐亭人民的生活习俗、语言特点等是艺术发展的天然种子，那么发达的文化教育、良好的物质基础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则是艺术发展的土壤。

乐亭县北靠燕山，南临渤海，土壮民丰，渔业、海盐的质量也是世界闻名的。故乐亭素有“冀东粮仓”、“鱼米之乡”之誉。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兴旺，也连带起艺术事业的飞跃发展。据乐亭县志载，自宋(金)后乐亭县科举中榜数字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光绪朝癸

末年(1883年)一科进士180人,乐亭就占了5人。清末乐亭治内,已经村村有了私塾或学校,穷苦之家亦大有读书之人了。“九·一八”事变前,县里就有了图书馆、师范和中学等文化设施,小学已达300余所。故乐亭县又有“文化县”之誉。

清代中、末叶,是乐亭的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乐亭大鼓从初级到高级,由高级到完善阶段的发展时期,同时又是阶级分化显著变化的时期。乐亭大鼓的发展,除了文化艺术本身的历史条件之外,与乐亭特殊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经济条件及显著的阶级分化等社会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历史阶段中,乐亭县权势显赫的豪门望族、高官显贵、巨商大贾大量涌现,他们上达天子,左右朝政;中结官衙,力撑沉浮;下连草野,影响社会。这些人,乡乡里里皆有门庭。仅以乐亭四大家族的崔、刘、张、史和六御史的王、白、李、杨、刘、史的家史小传,对于上流社会的实况已可略见一斑。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的相互作用,也可看到乐亭大鼓产生、发展的必然性。在这些人的家里,乐亭大鼓已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稍缺的宠物,他们长年包佣着说书班子,茶余饭后要玩味,安寝之前要欣赏,至于那些要员显贵们,除了娱乐方面的需要之外,还要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装点美化家族门庭的书香气味。那些显贵夫人、大家闺秀,对乐亭大鼓更是上瘾成癖,只要是说书的鼓板一响,她们便如闻到聚将令一般,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停止一切活动纷纷而至。高贵者要“垂帘听政”;土气者则相对而坐直接观看。那些穷苦之家的男女老少,则只能是“趴墙窃听,倚门而望,济济四野而不顾犯

法”了。

以崔家庄园为核心的乐亭城南郎君庙村，被称为“京东第一皇庄”。崔家祖籍吉林长白山崔家沟，系满洲汉军正白旗，始祖崔景禄是努尔哈赤的军中都尉，后随顺治入关。清定都北京后，为笼络人心，对功臣实行围田封赏策略。崔家被封疆在乐亭郎君庙，跑马行圈占地后，永平府滦河以西的稻地、古冶、榛子镇一带的大部、迁安一部、乐亭城南、城东的大部民田被圈为崔家旗地。租赋统归崔家，作为俸禄。迨中清以后，崔家人繁势浩，建有多处庄园，占地数千亩。主建筑群门前建有石狮十座，号称“十狮营”，占地一千二百亩，崔家人多在各级官衙供职。

崔家重视文化教育及民间艺术，晚清时的文中堂徐郅就曾长期得到崔家的资助与培养，他与崔佑文结把兄弟并认崔母为义母。后来高中状元，又升任内中堂。由于这层关系，崔家越发财粗势大，炙手可热，可直通五府六部，便入出于王府皇宫。至崔佑文一代，崔家与社会的交际更宽。崔佑文本人对文艺的爱好似痴若狂，他不惜重金网罗人才，组建了多剧种的几个班社，皮影班就有两个，还有梆子班、莲花落班等。对乐亭大鼓更是酷爱，乐亭大鼓艺人在崔家接踵不断，长年供养，几乎是日日有场，时时可闻。

刘家以经商发家，被誉为“京东第一家”。祖居乐亭城北刘石各庄村。创业人刘新亭，知人善任，家道迅速发展。后又农、贸并举，银、当兼营，买卖遍布全国，最密集处当数东北三省。至中兴期，房舍逾千，主建筑群南北长二华里，东西宽一华里。拥有土地近五百顷，车百多辆，佣工数百人，乐亭在外地佣工者达数万人，大都在刘家的店铺中

任职。因此，历年多有艺人赴外地为其买卖商号去演出，乐亭大鼓便藉此得以向东北等地区发展蔓延。

刘家与社会名流过从甚密，光绪帝的弟弟震贝子与刘兆熊为至交，刘家上下人等皆可免礼相见；鲍超、曾国荃办军务，以及后来的曹锟贿选都曾得到过刘家的大力资助。张作霖曾向刘家借饷；慈禧亦曾借过一百万两银子；民初大总统黎元洪亲手给刘家宗祠题写过匾额。

刘家深谙事故。他们深切懂得，知识、仕途及人才与刘家财势的关系，因之比较注重信誉，重视教育，为办学、筑堤等慈善事业，每年多有捐助。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徐店创办了私立第一学堂，民国初年又在本村创立初、高两级学校，并增设乙种商业班。因此，后来刘家子弟多有入高等学府或出仕为官者，并有数人留学英、日等国家。

刘家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在随着他们的财势的发展而发展，财势越大，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迫切。喜庆之日要有文艺活动，平常的日子也要有。在他们的楼、台、亭、榭中，或于假山、画廊边，常有敲鼓击板地乐亭大鼓艺人献艺做场。刘家在政治经济上要求强、盛、尚、上；在文化艺术上要求新、奇、怪、异。当年著名乐亭大鼓艺人陈活埋到刘家作艺时，主人要求他用新腔新调唱新书——《儿女英雄传》，当时并无这部书的唱词脚本，陈活埋说，请等三天以后吧！三天以后，主人如愿以偿。他实际上是在跑梁子说书，即演员只记故事梗概，临时即兴演出，俗语也叫“趟水”、“水口活儿”。正是刘家的这一要求，促成陈活埋首创鼓曲界水口说书的首例。

史家祖籍江阴，明万历间徙居乐亭城南大港村，发家由

史梦兰始。兰祖父为太学生，兰先以举人进身，后受四品衔。因其才思敏捷，为官清廉，颇受皇帝及重臣等之器重，多次参与国家要事。初是于咸丰十年，英法等列强对我内犯时，僧格林沁招募乡勇团练，至沿海一带加强国防，兰参与其事；继是曾国藩开设礼贤馆，手书招致；后又与李鸿章共同主持重修《畿府通志》、《畿府丛书》等活动。史梦兰一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独有建树，在文化艺术上亦多有投资。他学识渊博，故有“直隶一人”之褒奖。主要著述逾三百二十卷。因其博学而不傲，望重而不骄，故上能使皇帝悦服器重，下能礼贤下士与之交往。对乡里之民风民气亦影响颇佳。他精通民间艺术，其府第亦是乐亭大鼓艺人活动的重要场所，不仅对艺人的水平要求甚高，且长于创作鼓词影卷。

张攻璞祖居乐亭城东南汤家河，靠经营木材发家，后于光绪朝用钱捐了个三品衔。他虽顶戴殊荣，却惯走于江湖道中；喜收藏古玩、字画；善书法、长音律，尤精养马、驯马、骑马之术，堪称奇人怪客、玩世高手。一次，慈禧宠宦安德海搞京城赛马会，张攻璞不畏权贵，不惧风险，一举夺魁，后被誉为“京东快马张”。他对文艺更为偏好，不仅养鼓书艺人于家不辍，还养有一个皮影班。他并亲自登台，以扬琴参加伴奏。

除上述四大家为主要代表外，乐亭县家富万金、势压一方的地主豪绅几乎乡乡都有。这些人，虽有骄奢淫逸、剥削人民的一面，但由于他们处于整个国家社会的大变动大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他们的行为也一反昔日封建官宦的常态，而为新潮流所推动。他们唯恐自己落人之后，唯恐同流社会中笑为不齿，唯恐乡里谓为无才无德，故而他们跃跃欲试

不甘落后，或维新变法崇尚新事物；或身体力行为民做点好事。他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总是不断出新、超前，是他们出资对艺术提出高标准、高要求。一个三流民间艺人，仅能在野台子摆地应付穷苦百姓，收入微薄甚至难以糊口；而一个一流艺人，则收入丰厚名利高贵，出入于富豪大家，被高敬高待，生活摆谱，傲不可言。

总之，清代中、后期乐亭的社会环境中，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乐亭大鼓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安定富裕的社会环境，不仅引导了富家大户的超前性要求，同时也激发了下层社会的超前性创造精神。这种超前性的需求关系，使业已成熟的乐亭大鼓艺术很快形成了犹如蛟龙入大海、干柴遇烈火般的发展势头。

另外，当时社会上帮会盛行。诸如庆典、许愿之类的活动相当频繁，对说书人是动辄有请，行则相邀。这就给说书人造成了天天有续、时时有待的有利局面，使这一时期的乐亭大鼓艺人的才智得到了空前的发挥与体现。所以，适逢同、光朝的乐亭大鼓，正是处于天时、地利俱备，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良好的有利时期。乐亭大鼓象潮流般发展，如风驰样散布。发展至此的乐亭大鼓已是人才济济如雨后春笋，新腔异调似百花怒放了。在众多的艺家之中，能够独树一帜且最有名气的有九家，他们是：陈活埋、齐祯、王恩鸿、陈俊山、翟子芳、商秀安、田紫阳、张国玺、吕占山。这九家声腔各异，演唱风格各有千秋，最有代表性，最受人们的欢迎。他们当时的曲调已有二、三十个，但被行内外推崇、传唱肯定的有十八种，各种唱腔的甩腔繁多，各有特色。因此，被时人总结概括为“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